

中國小學史

(修訂本)

胡奇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小學史

胡奇光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修訂本前言

這本《中國小學史》，是一部從文化史角度撰寫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小學原是“徵實”之學，常用來解決識字、解經、寫詩時碰到的實際問題。隨着小學的發展，專門術語層出不窮，含混概念也隨之雜生，以致弄得有些韻書成了天書。對此，我們擬通過學術淵源的推究、語文實例的驗證、現代語言理論的剖析等手段，力求還小學的本來面目，讓小學“食人間煙火”。早在 1984 年撰稿之初，時任“中國文化史叢書”編委會常委的朱維錚，曾對《小學史》的撰寫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要讓外行人看得懂，叫內行人看不到外行話！”本着這精神，我懷着立足語言學、面向文化界的初衷，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終於把《小學史》的書稿寫出來了。

這本書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兩個版本，一是 1987 年列入“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的初版本；二是 2005 年收入“專題史系列叢書”出的再版本。再版本在內容上有些補充修正。這兩個版本均用簡體字排印。

現在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的是這本《小學史》的繁體字版修訂本。

自去年九月至今，我和責任編輯通力合作，使這本《小學史》的修訂工作，上了一個臺階：

一是在 2005 年再版本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再作些力所能及的補正。如增添幾部重要著作的內容介紹，增補幾條學術傳承、

遙相呼應的史料，改正數處重要的差錯等。

二是全書文字校訂上，着力審校引文，即用繁體字的原文審核簡體字的引文。書中每條引文均查到古書裏的原文，並按原文逐字還原為相對應的繁體字。所采用的繁體字的正誤，視原文而定。如“钟”為繁體字“鍾”“鐘”的簡體字。《廣韻》二百零六韻說的“冬钟同用”，此處“钟”，原文為“鍾”，不作“鐘”；《說文》“鎗”字注“執竟以鼓统于钟”，此處“钟”，原文為“鐘”，不作“鍾”。音同字異，決不混用。引文字句的對錯，亦視原文而定。長期以來，借“蠹”為“蟲”，已習以為常了，但在《說文》里，這是根本不同的兩個字。“蠹”為蜘蛛，“蟲”是食草根的害蟲。而初版本、再版本却作：“蠹：虫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豈非張冠李戴？現修訂本對此已作改正。看來，宋文濤提出的審核引文，這確是修訂舊作的高招。

我年逾八旬，有幸遇見宋文濤。他有才華，有主意，能吃苦耐勞（全書引文的逐一查核），又能體貼老人（送清樣到家），都叫我感奮不已。孔子說的“後生可畏”，大概也可指像他一樣的人吧！

修訂沒有止境。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奇 光

2018年7月6日

目 錄

修訂本前言	1
緒 論	1
一、“小學”涵義的演變	1
二、小學的基本內容	4
三、小學傳統的特點	7
四、小學歷史的分期	12
第一章 小學的發端——先秦時代	16
一、古人關於文字起源的討論	16
二、孔子“定名分”與墨子“正名字”	19
三、《墨經》的語文符號論	24
四、名實之爭與荀子《正名篇》	30
五、古書訓詁的萌芽	37
第二章 小學的創立——兩漢時代	45
一、“書同文”與字書的出現	45
二、小學因古文經學以立	48
三、訓詁書之祖《爾雅》	54

四、《禮記》裏的社會方言	64
五、揚雄奠定小學的基礎	67
六、許慎《說文》是文字學寶典	74
七、鄭玄研究小學的方向	94
八、《釋名》開探索語源之先河	100
 第三章 小學的發展——六朝隋唐時代	108
一、言意之辯由玄學及文學	108
二、從俗字書到字樣學	113
三、孫炎反切與梵文拼音學理	124
四、四聲・平仄・詩律	130
五、《切韻》與南北讀書音的統一	138
六、守溫字母與等韻源流	144
七、從儒家義書到佛家義書	154
 第四章 小學的轉折——宋元明時代	170
一、與近代白話文學相適應的語言觀	170
二、由《廣韻》進而探求古音	173
三、《中原音韻》是普通話音系的歷史源頭	181
四、古文字、六書學與民族文字的創制	187
五、從“右文說”到《通雅》	198
六、文章作法裏的語法觀念	206
 第五章 小學的終結——清代	214
一、由音韻文字通經子百家	214

二、古音學的發明：從顧炎武到章太炎	221
三、戴震與詞源研究的演進	232
四、以段玉裁為代表的文字學研究	240
五、以王念孫父子為代表的訓詁學研究	262
六、阮元論語言與文化	278
七、姓氏、稱謂、避諱	284
八、方言俗語的“尋源”	292
九、虛字・辭例・《馬氏文通》	301
十、小學後殿孫詒讓與古文字學	312
 結語 奔向現代的語文新潮	 320
 初版後記	 341
 索引	 343

緒 論

一、“小學”涵義的演變

在漫長的歲月裏，漢民族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研究着本民族的語文，研究着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標幟的漢語漢字；就是在中印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之際，漢民族吸收外來的新知，也往往從研究本民族語文的實際需要出發。他們還給那種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學問，起了一個十分別緻的名字，叫作“小學”。

我們在這部“小學史”裏，打算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從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去探索，以便通過對中國小學發展歷史的概括敘述，能更好地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

“小學”這個概念，在中國的不同歷史時期裏，有着不同的具體內容。

早在周代，“小學”自然不是指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學問。它與“大學”對舉，是指為貴族子弟而設的初級學校。古人說的“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①，即是明證。以“小學”指稱文字學，始於西漢，具體說，始於劉向、劉歆父子。他們在那部可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圖書分類目錄的《七略》裏，第一次把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為“小學”。小學的創始人，便是揚雄、杜林、

① 《說文解字注》卷十五《叙》“《周禮》八歲入小學”句段玉裁注語。

許慎、鄭玄^①。

從東漢至隋唐五代，人們賦予“小學”以更爲豐富的内容。《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後序說：“魏世又有八分書（即“漢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其中，“音義”，着重形音義的溝通，爲文字的通論；“訓詁”專論字義；“聲韻”專論字音；“體勢”專論字形。至於《說文》、《字林》，爲文字學的最早專著。但《四庫全書總目》批評說：“《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經部·小學類序》）其實，把由印度文化影響而產生的音韻學著作與文字學經典《說文解字》等一起列入“小學”類的，正是魏徵等人撰寫的《隋書·經籍志》；把訓詁書的鼻祖《爾雅》首次歸入“小學”類的，又正是後晉劉昫等人撰寫的《舊唐書·經籍志》。

明確地以“小學”指稱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當從宋代開始。歐陽修在《崇文總目叙釋·小學類》裏提出：

《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

如果把“字書之學”和“偏傍之學”合稱文字之學，那“小學”就作爲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專稱了。事實上，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

① 關於小學的創始者，約有三種提法：一說是杜林。杜著有《蒼頡訓纂》、《蒼頡故》，均已散失。《漢書·杜鄴傳》盛贊杜林文字學造詣出衆，“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一說是許慎、鄭玄。許著有《說文解字》，鄭主要是箋《詩》注《禮》。馬建忠《馬氏文通序》說：“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乃權輿焉。”一說是揚雄、許慎。揚著有《方言》。黃焯說：“小學本稱爲揚、許之學。”見《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2頁。

志》、王應麟《玉海》已經這樣做了，他們把“小學”分為三類：一、體制；二、訓詁；三、音韻。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就更為清楚地說：

惟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

所謂“古義”，據說本之於《漢書·藝文志》：“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這不過是託古之詞罷了。且不說班固寫《漢志》時我國尚未出現“韻書”，就是《爾雅》歸屬“訓詁”類也是遲至五代才告解決的。只是《四庫全書總目》遠祖《漢志》、近取唐宋人之說，為之折衷，那體例確也“謹嚴”些，因而影響也較深遠。

到了清末，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丙午（1906年）第十二、十三號上，發表了《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他指出，作為文字、音韻、訓詁的總稱的“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相應地，他認為研究語言文字的方法，也不能局限於離析性的考釋，而要進行綜合性的研究：

若專解形體及本義者，如王菴友所作《說文釋例》、《說文句讀》，只可稱為說文之學，不得稱為小學；若專解訓詁，而不知假借引申之條例者，如李巡、孫炎之說《爾雅》，郭璞之注《爾雅》、《方言》者，只可稱為爾雅方言之學，不得稱為小學；若專解音聲而不能應用於引申假借者，如鄭庠之《古音辨》、顧寧人之《唐韻正》，只可稱為古韻唐韻之學，不可稱為小學。兼此三者，得其條貫，始於休寧戴東原氏。

在他看來，文字、音韻、訓詁的關係，不是三足鼎立的關係，而是三位一體的關係。他因此特別贊賞乾嘉學者倡導的從音韻通訓詁、以音韻證字形的原則。這種“小學”觀的轉變，導致語言學的現代

化。他提出以“語言文字之學”代替“小學”的獻議，“正标志着傳統‘小學’的終結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始”^①。

“小學”一詞從漢代用到清末，幾乎與整個封建社會相始終。我們現代所用的“小學”一詞，係指中國封建社會的語言文字學。

二、小學的基本內容

中國古代的經籍，常用神奇的漢字、古奧的文言寫成。要解讀經籍，先要通過漢字、文言等難關。而要通過漢字、文言等難關，就用得上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這三門學問。通常說的小學，便是以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為基本內容的。

文字學

在古代中國，習慣上把研究漢字的學問稱為文字學。文字學在歷史長河裏先後形成四條支流。

第一是說文學。說文學以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為研究對象，故又稱“許學”。這是文字學研究的主幹。《說文解字》的長處在於就字形解說字音、字義。這字形、字音、字義的統一，正是漢字不同於拼音文字的地方。說文學以清代最盛，就中最負盛名的巨著首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第二是字樣學。字樣學要求區別正字、通用字和俗字，以確定文字的形體標準和使用規範。這實際上是古代的正字法。愈於唐代顏師古，他的四代從孫顏元孫作的《干祿字書》，是字樣學的代表作。

第三是六書學。宋人長於說理，文字學研究的重心相應地從

^① 濮之珍、高天如《“五四”運動和中國現代語言學》，載吳文祺主編《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8頁。

《說文》移向“六書”。鄭樵甚至認為，不懂“六書”，就不能通《六經》（《通志·六書略》）。經他的倡導，“六書”學漸成風氣。其中較有特色的著作是宋元間戴侗的《六書故》。

第四是古文字學。今人稱秦漢以前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戰國時通行於六國的文字為古文字。北宋呂大臨開了考釋金文的先聲，但古文字學的創立，却有待於1899年甲骨文發現之後，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大師的努力。古文字學異軍突起，它研究的內容已超出了小學研究的範圍。

音韻學

音韻學研究漢語各個時期的語音系統及其演變規律。它因研究的重點不同而形成四個不同分支。

一是“今音學”。宋元學者稱隋唐宋的語音為“今音”，故名。其實可稱“中古音”。因研究的對象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及宋代陳彭年等重新修訂的《廣韻》，故又稱“切韻學”。《切韻》、《廣韻》在音韻學上的地位，猶如《說文》之於文字學一樣。“今音學”的開山之作是清代陳澧的《切韻考》。

二是古音學。宋元學者稱周秦兩漢的語音為“古音”，故名。其實應稱“上古音”。古音學的先行者是宋代吳棫，後經明代陳第、清代顧炎武等人的研究，開始走向科學化的道路。清代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對古音學的貢獻尤為卓著。

三是北音學，或曰“近音學”。北音指近代北方話的語音系統，又稱“近代音”。北音學的奠基之作是元代周德清作的《中原音韻》。

四是等韻學。等韻學是以音節表為主要方式對漢語字音進行分析的一門學科。等韻借鑒梵文悉曇章(Siddham)。而悉曇原是印度小孩子剛識字用的拼音表。現存等韻學著作以宋人的《韻鏡》最早。

訓詁學

按照傳統的看法，小學裏除了文字學、音韻學之外，都算是訓

詁學。訓詁學旨在解讀經籍裏字、詞、句、篇上的疑難。這種疑難見之於字義、詞義，也見之於詞、句裏的語法義，還見之於詞、句、篇裏的修辭義。這就難怪傳統訓詁學裏包孕着語法學、修辭學的萌芽。

從現存通釋語文的專著看，訓詁學有五個分支。

首先是雅學，即專門研究《爾雅》的一門學問。雅學是訓詁學的主體，以東晉郭璞《爾雅注》、清代郝懿行《爾雅義疏》最著名。

其次是方言學。方言學以西漢揚雄《方言》為研究對象。揚雄開了個人從事活的方言調查的先例，但後繼乏人，到清代，人們往往還從古書上考求方言詞最早出處。其重要著作有錢繹的《方言箋疏》。

第三是詞源學，或曰“語源學”。詞源學研究詞的形式和意義的來源。這是訓詁學的尖端。東漢劉熙《釋名》，開了用音訓求語源的先河。到清代，從古音求古義，探索詞源，成了訓詁學研究的新動向。程瑤田的《果臝轉語記》、王念孫的《釋大》，便是詞源研究的力作。

第四是俗語學。俗語學研究包括成語、俚語、諺語在內的俗語。始於南朝問沈約的《俗語》（已佚），到清代，俗語研究從方言學裏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學問。翟灝《通俗編》、錢大昕《恒言錄》、郝懿行《證俗文》均為俗語學的名著。

第五是虛字辭例之學。墨子解“且”字，開了虛字研究的先聲；《公羊傳》揭示“美惡同辭”等現象，作了辭例探索的示範。到清代，虛字辭例之學被推向新的高度，虛字研究，以王引之《經傳釋詞》最精，辭例探索以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最好。虛字辭例之學是語法學的先導。清末，馬建忠著《馬氏文通》，標志着傳統小學向現代語言學轉變的開始。

小學的三大部門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有內部聯繫的：以音韻作為貫穿文字、訓詁的主綫。由於小學所研究的文字，畢竟是

記錄有聲語言的符號系統，因而早在漢代，就有了從字音求字義的做法，宋代也出現了音韻學向文字學滲透、逐步同訓詁學溝通的趨勢；到清代，以音韻證字形、從音韻通訓詁就成了乾嘉學派小學研究的旗幟。

三、小學傳統的特點

從文化史上看，中國小學與外國語言學的一個共同之點，就在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語言本是民族文化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其他如音樂符號、數學符號等等，均無法與之相比，它們必須在語言的基礎上，並借助於語言的解釋，方能為普通人所理會。

語言的要素有三：語音、詞彙（詞義）、語法。其中尤以詞彙最直接、最及時、最豐富多彩地反映着人世間種種動態。當嬰兒發出第一聲“爸爸”、“媽媽”的時候，就已經涉及語言與文化關係裏的一個典型問題：親屬稱謂與家族制度的關係。人類的幼年期亦與此相仿，他們首先探索着命名的問題，這在中國叫“名實之爭”，在古希臘是“詞和物”關係的討論。直至近代，西方語言學家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仍以“詞和物”作為行動的口號；中國一直以“名與實”作為小學研究的主綫，用古人的慣用語來表示，即是“名物訓詁”。“名物訓詁”就是考求“詞和物”的關係。因為詞彙原是反映文化的鏡子，記錄語詞的文字又是文明社會的標尺。

可是，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上，中國小學又有自己的歷史傳統，顯出與外國語言學不同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條。

第一條，小學研究的核心是形音義三者的關係。

小學研究的歷史趨勢，是從狹義的字形、字音、字義的研究，發展到廣義的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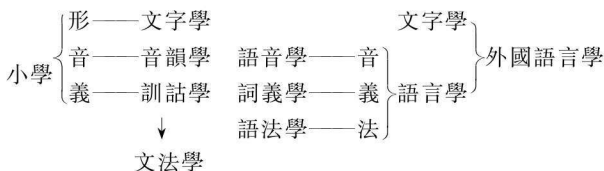
我國與印度、希臘羅馬同為世界上最早研究語言的國家。印

度、希臘羅馬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我國的語言屬於漢藏語系。印歐語有形態的變化，所用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因而它們的語音學、語法學最為發達。而我們的漢語，在古代是單音節語，缺乏形態的變化，與單音節語相適應的是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一個漢字代表着一個音節，這要求優先發展文字學、訓詁學。古代《爾雅》、《說文》等名著研究的，就是字形、字音、字義的關係。

自東漢以降，音韻學的勃興，使我國小學的面貌為之一新：音韻學先是與文字學、訓詁學鼎足而立，繼而與文字學、訓詁學凝成一體。清代學者深明以音韻貫穿文字、訓詁的道理。阮元說：

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為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①

至於文法，主要地依屬於訓詁，部分地附麗於辭章。這一切，就有別於外國語言學。外國語言學裏，有語音學、詞義學、語法學等分支，而且文字學與語言學並列，不像小學那樣兼包文字學。與外國語言學比較，便可知道小學的內容了：



第二條，小學的根本方向是解決古代文字上的實際問題。

作為小學萌芽的字書，如《史籀篇》、《倉頡篇》^②等，都是為了更好地進行識字教育。但後來的小學研究，逐漸形成了解決古代書面語上實際問題的傾向，那是與經學的研究有關的：經學是古代文化的主體。

① 阮元《學經室一集》卷五《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② 《倉頡篇》也作《蒼頡篇》。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①漢代獨尊儒術，孔子所選的《詩》、《書》之類，也一一尊為儒家的經典。那經典的傳本，一用今文書寫，一用古文書寫。對經典不同鈔本的理解不同，遂引出不同的學派：一為今文經學，一為古文經學。古文經學尊重用古文書寫的經典，常在文字的考釋上下功夫。宣告“小學”成立的，不是別人，恰是古文經學創始人劉歆，這絕不是偶然的。從此，小學的作用從識字教育提到解釋經籍的高度。這裏說的“經籍”，指包括儒家經書在內的一切古籍。小學的解釋首先是經書，其次是經書以外的古籍。如果只說小學為經學服務，那未免太籠統了。

小學為解釋經籍服務，這一點確定了小學研究中種種不同的關係。

其一，在語文事實與語文理論的關係上，以語文事實的研究為主。

小學原是“徵實”之學，以經典釋文為本。相比之下，對語文理論的研究就嫌不足。雖然先秦出現《墨經》、《荀子·正名》那樣熔語言學、名學為一爐的篇章，但自漢代以下，語文理論或者依附於經學、文學等論著，如魏晉至清代關於言意關係的討論，大抵以《周易·繫辭》裏“言不盡意”及“立象以盡意”一段論述為基礎，進行不同的發揮；或者融化於具體考釋之中，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書中許多條目，可視為語文短論。這些做法的好處在從語文事實出發，來研究語文，但是以此為止境，也就成了缺點了，一定要由此而開拓出語文理論體系創造的新路。

其二，在文字與語言的關係上，更以文字的研究為主。

文字原是標指語言的書寫符號，而古人重視文字的程度遠遠超過語言：在錄音設備尚未發明的古代，文字確有記久傳遠的性

① 《後漢書·徐防傳》。

能，幫助語言的交際突破時間上、空間上的局限。而且漢字又是一種表意文字，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帶有“超方言”的性質，就是說，漢字的字音在各地是不同的，人們各依方音來閱讀，但它的字義對各地却是一致的，說各種不同方音的人都可用它來交流思想，達到相互瞭解。這樣，儘管我國幅員廣大，方音分歧，漢字在維護國家統一、繼承文化遺產上仍有特殊的貢獻。據此，古代小學家特別重視文字的形、音、義的考釋；為求在全國樹立字形、字音、字義的規範，他們常采取辭書的形式來表現，如《說文》、《玉篇》之類字書，《切韻》、《廣韻》之類韻書，《爾雅》、《方言》之類義書，均為古代語文規範的樣板。

其三，在古代與當代的關係上，又以古代語文的研究為主。

章太炎說得好：“小學者非專為通經之學，而為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論語言文字之學》）事實上，小學家往往打着“通經”的旗號，去通一切古籍。到唐代，經典逐漸成了一切古籍的代名詞。佛學者慧琳在《一切經音義》裏，所徵引的書遍及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到了清代，通古籍就不僅指解釋古代史籍了，還有保存文化遺產、發揚民族意識的一層意思在內。由於小學重在古代語文，必放鬆對當代語文現象的研究。像秦始皇采用小篆、唐玄宗選定楷書那樣的做法，真是寥若晨星。到現代，語言學研究就把當代語言現象放在首位了。

其四，在“雅言”與方言的關係上，就以“雅言”的研究為主。

與方言相對，“雅言”指共同語。在方言分歧的社會裏，人們往往選擇一種使用較廣的方言，作為通用語，來溝通各方言區之間的交際。從我國情況看，那種作為各方言區之間交際工具的通用語，往往就是政治中心所在地。在西周，因建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遂以秦音為雅音，這個標準到東周亦未變。《論語·述而》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即是明證。“雅言”的出現，是我國古代社會力求趨向統一的一種標志。從周